

Z H O N G G U O
X I A N D A I
F E N G C I S H I
Y A N J I U

杨四平 陈 敢◎著

中国现代研究

讽刺诗

讽刺诗是讽刺诗人的主体精神超越于各体现实散文趣味的产物。它与史诗和抒情诗的艺术表现方式有别。它是讽刺诗人以满腔的愤怒、微妙的智慧和冷嘲热讽的语调，对偏狭的、虚伪的、丑恶的现实世界的痛恨或鄙视的诗歌品格。中国第一个直接运用讽刺诗的文体大家是刘勰。他说：“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①这里讲的是诗人讽刺。（《诗经》的作者）而白居易提到的“歌诗讽刺，则更趋近于讽刺诗文体层面了。他说：“采诗听歌，异人言，言者，罪闻者也。”（《白居易集》）根据他的研究，我们认为讽刺诗的产生有它的社会经济基础、伦理道德基础、哲学思想基础与文论基础。首先，从讽刺诗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来考察。大家都知道，人类的历史总是光明与黑暗反复交替的历史；而且光明期总给人愉快但却总是很短暂，而黑暗期总给人沉闷但却总是很漫长。一般地说，讽刺诗产生的契机就在于光明与黑暗交汇的当口。换言之，太光明了，太黑暗了，均产生不了讽刺诗。太光明了，一切令人欢欣鼓舞，无讽刺对象可言；太黑暗了，统治阶级（被讽刺者）防口如防川，诗人敢怒不敢言。

广西人民出版社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中国现代讽刺诗研究

杨四平 陈 敢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讽刺诗研究/杨四平,陈敢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5

ISBN 9788-7-219-06164-0

I. 中… II. ①杨…②陈… III. 汉语—讽刺—话语语言学—研究—现代 IV.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1524 号

监 制 尹邦云
责任编辑 陈 红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6号)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南宁千友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4.7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164-0/H·59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讽刺诗呼唤批评

40年代与新时期都是20世纪中国讽刺诗发展进程里具有标志性的时段。40年代,马凡陀的山歌一出,就一改20年代、30年代讽刺诗一度低落的局面。现代讽刺诗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其标志性的人物有马凡陀、臧克家等。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又一改讽刺诗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歉收(令人焦心的歉收——臧克家语)的窘况;现代讽刺诗出现了第二次高潮,其高峰式的人物有刘征、池北偶、易和元、黄永玉、陈显荣、张维芳、石河等人,讽刺诗这朵花,^①在新时期开得很艳丽。但是较之以新时期讽刺诗在创作上的丰收而言,新时期讽刺诗在理论上是歉收的;同样,较之以新时期其他诗体的理论研究而言,新时期讽刺诗的理论研究几乎是“门前冷落鞍马稀”。至今,我们还没有系统的中国当代讽刺诗史,也没有一本学术性的中国讽刺诗美学之类的专著,更没有一本严谨的中国讽刺诗文体学的著述,好像我们的理论界把讽刺诗这一文体给遗忘了。我们想,造成这种讽刺诗的创作与理论呈畸形发展的现状的主因不外乎:

(1)讽刺诗与现实生活几乎是“同步”的艺术,是现实生活的一面“反光镜”,起着调节生活节奏和人们心理节奏的美学干预作用;讽刺诗,从题材上看,要么干预社会,要么干预性灵,要么既“介入”社会又“介入”性灵;从美学品格上看,它要么追求“单一的打击性”(老舍语),要么追求“多层面的抨击性”,要么刚柔相济,于嬉笑怒骂中,讽刺诗皆可成文章。所以说,讽刺诗是一种极为敏感的介入文学,而历史给我们批评界所造成的太多的阴影(如“乌台诗案”之类),使批评之笔“敬而远之”。

(2)讽刺诗常与民谣、打油诗、顺口溜等民间艺术相邻。周作人说:“讽刺诗出于杂调曲,本为民间娱乐,重在通俗,即经转变,旧质

^① 臧克家:《讽刺诗这朵花——〈中国百家讽刺诗选〉序》,见《中国百家讽刺诗选》,罗绍书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仍有,故不避嘈杂粗鄙之辞。”因此,有人认为讽刺诗不具备艺术品格,故而不屑一顾。我们以为这完全是对讽刺诗的一种偏识。其实,讽刺诗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诗体之一,贺拉斯、朱文纳尔是世界重量级的讽刺诗大家,我国的《诗经》里就有了讽刺诗的雏形,而且“下以讽上”又是我国讽刺诗论的发端;文人的讽刺诗创作与民间打油诗、顺口溜有别。

(3)讽刺诗常见的表现方式有独白与戏拟,而它们往往又具备通俗的喜剧性和降低了音乐性,这样,讽刺诗人与他的讽刺诗就会给批评家制造“双重误会”：“敏锐而明快的作家的不幸的是：人们以为他们为肤浅，因此，不在他们身上下苦功；晦涩的作家幸运的是：读者费力地读他们，并且把自己勤奋地快乐也归于他们。”（见尼采的《出自艺术家和作家的灵魂》）因此，乍一看，讽刺诗，这一冬天的文体，提供的“可评性”极少，因而，批评家不愿在它身上“下苦功”。

(4)可供讽刺诗论生长的园地，在理论圈内极少，换言之，讽刺诗论几乎没有“自己的园地”，它们只有散兵游勇了，这也许给某些批评家造成了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批评的尴尬。

(5)当下，讽刺诗的创作，还没有完全摆脱、突破王亚平在40年代就指出的讽刺诗创作上的局限，那就是：“检讨诗我们对于这方面的创作表现，是在还不能深刻而有力、辛辣而尖锐地写出配合政治现实发展的优秀政治讽刺诗……我们的诗人还没有像白德纳衣者从讽刺人物的心理上、行动上、言谈上、著作上、为人上，历史地去分析他、把握他、刻画他；然后再以最富于形象地讽刺技巧，以达到政治讽刺诗的艺术。”王氏虽说的是政治讽刺诗的艺术表现不足，其实，我们以为，这也是用于当下的性灵讽刺诗的写作状况。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讽刺诗人提高文体自觉的同时，我们的批评家对讽刺诗应抱有应有的学术热情和应有的学术兴趣（而不是冷嘲热讽），以使当下“无轨”的讽刺诗创作在健康的、正常的轨道上发展着，并最终使它们具有更高的历史品格、美学品格和文体品格。

序言 玫瑰花开映日红

张维芳

著名青年诗评家杨四平先生和陈敢先生的新著《中国现代讽刺诗研究》一书,在付梓之前,我作为一个酷爱讽刺诗的老作者,有幸先睹,第一次见到这么一部专论讽刺诗的学术著作,感到由衷地高兴和感动,值此之际,谨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自幼酷爱讽刺诗,爱她红红的花,更爱她尖尖的刺儿。爱她开花,是为了献美于世;爱她长刺,是为了维护美好的生活的权利和尊严。杨四平先生和陈敢先生对讽刺诗、对写讽刺诗的人们,更是满腔热忱,爱之有加,并时刻关注着讽刺诗,为讽刺诗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汗水和智慧,充当了讽刺诗的教练、裁判、“啦啦队”,为讽刺诗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的《中国现代讽刺诗研究》一书的出版问世,就是一个令人惊喜与钦佩的印证。他们凭着深厚的诗词学识功底和严密细致的逻辑思维,更基于对讽刺诗艺术的满腔挚爱,知难而上,敢于在不少学者未曾和不愿涉及的层面上下工夫,广征博引了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并经过反复推敲、深入探讨,对中国现代讽刺诗的发展进程,进行了系统、全面、客观、独到的评论与赏析,撰写出了大量的精美文章,以求求真务实的精神和文辞之美的魅力,历经数载,终于如愿以偿地完成了这部学术著作,充分体现出年轻学者良好的研究素养和审美理念。这部书是一项广博浩繁的富有学术价值、信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精品工程,在讽刺诗的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此书的问世,不仅从讽刺诗系统理论上而且从具体的创作实践上,填补了中国古往今来讽刺诗发展史上的一项空白,写下了讽刺诗发展史上的崭新一页!令人可敬可佩!

讽刺诗是诗歌园地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品种,自古有之,源远流长。因为她干预生活、鞭挞丑恶,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而深受读

者喜爱;也正因为她有刺儿,锋芒犀利,触及某些人的疼处而犯忌。所以说,讽刺诗的命运是多舛的,其发展历史是历尽坎坷的,讽刺诗真正繁荣发展的高峰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新时期政治昌明,社会进步,民主气氛空前高涨,给讽刺诗提供了生长的土壤、阳光、空气和水分,使讽刺诗这朵花鲜艳怒放,枝繁叶茂。我曾在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文学50年》一书中,以《浅谈改革开放以来讽刺诗的创作》为题,对新时期的讽刺诗创作作过一番概括。从有关资料得知,从事讽刺诗创作的作者,由80年代初的屈指可数的个人,发展到90年代的200~300人;讽刺诗的发表园地,80年代曾一度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报刊。新时期的讽刺诗创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讲,都可称得上是“四十年代后的第二个春天”(臧克家语)!这对于一向酷爱讽刺诗的作者和读者来说,的确感到欣喜、开心!无不感谢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给讽刺诗创作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从《中国现代讽刺诗研究》一书中,所列举和推出具有创作实力和卓越成就的一些诗人来看,多是在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他们可以说是现、当代讽刺诗发展史上的一幅缩影,他们的成就是应该载入史册的!

时代需要讽刺诗,人民需要讽刺诗。需要,便是讽刺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和必然。但讽刺诗这朵带刺的玫瑰,只有得到诗评家这些“园丁”们的精心培植和呵护,才能茁壮地成长,有旺盛的花季。在2000年11月间,《诗刊》社为我和姜建国二人举行的讽刺诗作品研讨会上,首都的几十位名家一致认为,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空前活跃,诗界也时有各种诗论出现,但对讽刺诗的专门研究却进行得很少,是一个薄弱环节。他们建议,我们的文学评论家,尤其是诗评家,要多关注一个讽刺诗的自身问题,多对讽刺诗这朵花加以扶持和呵护。杨四平先生和陈敢先生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就像一个年轻的老“园丁”那样,对讽刺诗倍加关注,这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精神!若众多的诗评家都富有这种精神,我国的讽刺诗艺术的发展前景,在新的世纪将会更加美好!

中國現代詩研究

劉弘



作者简介



杨四平，男，1968年生于安徽省宿松县，现为安徽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偶尔写新诗，主要研究新诗，在《光明日报》、《诗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等报刊发表诗论近百篇。出版诗论专著《20世纪中国新诗主流》、《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等11部，其中研究讽刺诗的专著有《刘征传论》和《罗绍书的审丑世界》2部。主编《中国诗学研究》、《大学语文》、《中国当代诗歌》（中英对照本）等3部。2007年获“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称号。

作者简介



陈敢，男，广西合浦人，本科和研究生分别毕业于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和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做国内访问学者，现为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和广西师范学院华文诗歌研究所副所长，对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有所研究，主攻中国新诗流派史，在《北京大学学报》、《外国文学》、《南方文坛》、《文艺报》、《理论与创作》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近70篇，合著和参编的著作10部。

目录

前言 讽刺诗呼唤批评 (1)

门前冷落鞍马稀——同步的艺术——与民间艺术相邻——“双重误会”——批评的尴尬——自身局限——学术热情

第一章 讽刺诗的诗学原理 (1)

第一个文体大家——文体自觉的发端——阶级社会“天人对立”的结构——儒学思想和犬儒学派——现实/语言的二元构造——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影响下的外国讽刺——实用理论和“文以载道”影响下的中国讽刺诗——与抒情诗、怨刺诗、讽喻诗、寓言诗的关系——乌托邦/实在界——“反写作”——边缘性——白天式写作

第二章 中国现代讽刺诗的发展轨迹 (8)

两次高潮——二三十年代的“类讽刺诗”——四十年代的第一个高潮——五六十年代国际题材的讽刺诗——“文革”中的陷落——新时期第二个高潮——马凡陀与“武出”范式——刘征与“文进”范式

第三章 中国现代讽刺诗的文体特征 (26)

喜剧性——喜剧性题材——审丑之眼——含泪的笑——“合一化”——以言写形——反客为主——音乐性——戏拟民歌民谣——诗化口语——独白体——戏拟体

第四章 任钧的讽刺诗 (38)

中国第一部现代讽刺诗集《冷热集》——“歌吟‘鄙俗的’时事和政治”——与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紧紧相连——“我们不过想替时代和人物描下一点真姿”——声讨法西斯——法西斯分子、不抵抗者、军火商、无聊文人——诗歌的时代使命——有力量的诗歌——诗歌的大众化

第五章 马凡陀的讽刺诗 (43)

缘起——“它怀胎着一个激变”——写在旗子上的诗——《马凡陀山歌》——喜剧性、音乐性和语体实验性——渐已逝去的幽默——到家乡去过春天

第六章 臧克家的讽刺诗 (60)

讽刺的种子——“政治斗争的一员”——讽刺类型——又一座高峰——《宝贝儿》——“刺向黑暗的‘黑心’”——讽刺的火力——指向内战——现实主义——不露声色——对话体/叙述体——“曲笔”——文人气质

第七章 苗得雨的讽刺诗 (68)

“孩子诗人”的讽刺——惊心动魄——韧的讽刺——重印象——“多层次抨击”——“借过来”/“接过来”——“自我们暴露、讽刺法”

第八章 刘征的寓言体讽刺诗 (73)

当代寓言诗第一人——宿缘——由散体寓言到诗体寓言——“外部寓言体讽刺诗”——《老虎贴告示》——“内部寓言体讽刺诗”——《海燕戒》——“文革”中的焚笔裂砚——新迷狂——《春风燕语》——人性癌变——《最后的香肠》

第九章 张维芳的讽刺诗 (89)

“有丑就亮出来吧”——《蒺藜集》——“化丑为美”——物质丑象与精神丑态的背向性——丑的狡黠性——丑的阴暗性——讽刺与世风——把讽刺诗当诗来写

第十章 陈显荣的讽刺诗 (95)

当代诗坛上的“辣椒哥”——由画而诗——泥土里长出的“辣椒歌”——诗的漫画、漫画的诗

第十一章 罗绍书的讽刺诗 (102)

清醒的文体意识——编中外百家讽刺诗选——《浅刺微讽集》——冷静中的崛起——苦心经营——干预社会——干预性灵——韵文独白/韵散合式独白——形式戏拟/内容戏拟——“辣味开心”

第十二章 姜建国的讽刺诗 (109)

子系统——《怪味豆》——新官场现形记——文人无能与无文——世俗面面观——外尊内卑——肢体写照

第十三章 石河的讽刺诗 (116)

从“滨之”到“石河”——蔷薇留香在人间——贺拉斯式——朱文纳尔式——“告别张打油”

第十四章 梁谢成的讽刺诗 (124)

《带刺的幽默》之户主——“杂烩”大世界——“社会多棱镜”——“人间众生相”——“故事新编录”——“手术刀”的艺术

第十五章 郭立河的讽刺诗 (130)

齐鲁文化——《搔痒集》——美学的“模子”——旧

瓶“辛”酒——名歌戏唱——“填料”

余论 中国现代讽刺诗的走向 (134)

走向合题——“文武合流”——讽刺形象的“他者化”程式——趋炎附势式——损人利己式——奇风怪俗式——沽名钓誉式——心灵阴暗式——讽刺诗文体三性——粗鄙的民间性——别样的叙事性——贫乏的喜剧性

后记 (141)

第一章 讽刺诗的诗学原理

讽刺诗是讽刺诗人的主体精神超越于客体现实中散文趣味的产物。它与史诗和抒情诗的艺术表现方式有别。它是讽刺诗人以满腔的愤怒、微妙的巧智和冷嘲热讽的语调,对偏狭的、虚伪的、丑恶的现实世界的痛恨或鄙视的诗歌品格。中国第一个直接用“讽刺”的文体大家是刘勰。他说:“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①这里讲的是“诗人讽刺”(《诗经》的作者)。而白居易提到的“歌诗讽刺”则更趋近于讽刺诗文体层面了。他说:“采诗听歌异人言,言者无罪闻者戒。……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②这些提法均可视为“讽刺诗”文体自觉的发端。

根据多年的研究,我们认为讽刺诗的产生有它的社会经济基础、伦理道德基础、哲学思想基础与文论基础。

首先,从讽刺诗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来考察。大家都知道,人类的历史总是光明与黑暗反复交替的历史;而且光明期总给人愉快但却总是很短暂,而黑暗期总给人沉闷但却总是很漫长。一般而言,讽刺诗产生的契机就在于光明与黑暗交汇的当口,换言之,太光明了,太黑暗了,均产生不了讽刺诗——太光明了,一切令人欢欣鼓舞,无讽刺对象可言;太黑暗了,统治阶级(被讽刺者)防口如防川,诗人敢怒不敢言。

自阶级社会以来,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结构,使人类孩童时期的“天人合一”的和谐解体;自此,人们就生活在一种“天人对立”的分裂状态之中。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己的身心失去了平衡,这就为讽刺诗的产生提供了空气、阳光和土壤。讽刺诗,一方面追念着那过往的“天人合一”的完整性和无限的潜能,

① 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白居易:《采诗官》,见《白居易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一方面批评着现实的龌龊和不足,一方面还希冀着未来的充实与完美。正是在这种“追念”、“批评”与“希冀”的讽刺情结中,在历史性与共时性的交响中,人类的讽刺诗诞生了。

其次,讽刺诗的产生有其伦理学的基础。在中国,讽刺诗的伦理基石是儒家思想。而在西方,它的表现则复杂得多。在古罗马和希腊化时期,讽刺诗的产生受到犬儒学派、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的伦理学社会思想的深刻影响。它们的原则是个人主义与清静无为。它们强调“未有德是一种善,罪是一种恶,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的唯道德是瞻的理论系统和价值标尺。它们是一元论、饱含强烈的现实感。

再次,讽刺诗产生的哲学指导思想也不可忽视。在哲学观上,讽刺诗人把世界当作一种现实——语言的二元构造。而抒情诗人只承认另一种现实——语言的一元关系,即语言就是现实或说现实就是语言。在抒情诗那里,现实被语言化了,在现实(即语言)的平面上,语言的垂直性的历史、文化以及审美特性被撞碎,由此,语言的认识、讽刺等潜质几乎消失殆尽。而在讽刺诗那里,语言仅是现实的表现工具。

最后,我们再考察一下中西讽刺诗产生的文论基础。

第一,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影响下的外国讽刺诗。

对文学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对模仿现实的史诗和悲剧的社会作用。柏拉图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亚里士多德则与之相反。希腊时期有三派:一是斯多葛派(坚忍学派),认为人生应摒弃享乐,恬淡寡欲,强调诗的内容和教化作用;一是伊壁鸠鲁派(享乐派),强调人生应该追求个人幸福和安宁,强调诗的娱乐性;一是逍遥派(散步学派),主张诗的教育和娱乐作用同等重要。这三派均重理性,反情感,对改变世界缺乏信心,并把恬静静穆、无忧无虑的生活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而新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时代,崇尚理性,要求诗人写出指斥时弊的、反映向善的诗歌,而讽刺诗又最能适应此。19世纪浪漫主义的勃兴,其重感性和情感而使重“唯理是从”的讽刺题材和精神渗透或散落在小说和戏剧里。讽刺诗在这个时期的存在,可以看成是对新古典主义的一种追怀。

第二,实用理论和“文以载道”影响下的中国讽刺诗。

实用理论的诗学观念在《诗经》中已显端倪,如“夫也不良,歌以讽之”,“不学诗,无以言”,诗“兴、观、群、怨”等。孔子认为文学主要从属于道德和社会作用。刘象愚说:“从公元前2世纪儒学在中国意识形成中正统地位的确立直到20世纪初,实用的文学观念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①周敦颐的“文以载道”的提出,将实用理论推向极致。当然,后来“二程”认为作文害道,就走了极端,而成了文学理论了。“文以载道”是实用理论的最高概括。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它与“诗言志”并驾齐驱。对讽刺诗人而言,它是讽刺诗人的主体意识自觉地通过对“反常地时代”的“时代反常”的揭露,已达到鞭挞、劝诫等作用。形象地说,“道”是讽刺诗人手中的鞭子或是讽刺诗人给病态的时代开出的一剂良方。对读者而言,通过研读讽刺诗篇,接受“道”的浸染,从而从善如流。换言之,如果说,抒情诗是表现的、审美的;那么,讽刺诗则是再现的、实用的。

讽刺诗与抒情诗有着天壤之别。

从视点上看,两者都是内视点的艺术。但是,抒情诗是内视点的内倾的艺术,而讽刺诗则是内视点的外倾的艺术(有人认为讽刺诗兼具内外双重视点,这是不妥当的。)抒情诗注重是观照对象时的“观感”;而讽刺诗更注重观照对象的本身。讽刺诗与其观照对象“粘得太紧”,是其视点外倾的表现;但诗自身的内视点又反复提醒它不能走得太远,否则就脱离了讽刺诗的文体轨道。在讽刺诗里,内视点的内倾与外倾相互争斗,使讽刺诗生成了一种两极之间的张力场,激发了讽刺诗的艺术活力。

以媒介而论,两者均向一般语言借用媒介,但两者在“借”与“破”上各有千秋。如果说抒情诗是在“破”后立“诗家语”;那么,讽刺诗则是在“破”后立一种“反诗”(相对于抒情诗而言)的诗化的口语。

讽刺诗指向理想,而抒情诗指向现实。讽刺诗感奋于现实中反常现象而怀恋理想;而抒情诗感奋于现实中令人向往的对象而歌唱

^① 刘象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田守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